

## 人文 齐鲁

## 解放区乡亲给共产党过生日

当年的解放区,7月1日这一天,庆祝共产党的生日,像过年似的,到处锣鼓喧天,欢歌笑语。

□苗得雨

在解放区,庆祝党的生日有区里县里的军民联欢大会,有村里的村民大会,各群众团体排队入场,集体落座。会前先互相拉拉唱,“识字班,来一个!”“儿童团,来一个!”农救会挑战妇救会,那些老妈妈,小媳妇们叽叽喳喳笑一阵,再唱:“大娘,大嫂子,大姐呀,咱们组织起来呀,参加了妇救会,替咱们申冤诉苦呀……”唱完便即刻还击农救会,在会场的另一角,那瓮声瓮气的腔调响了起来:“七月一,七月一,男女老少都欢喜,打起锣鼓开大会,庆祝共产党过生日……”战争年代是歌唱的年代,老少都会唱。

有别的庆祝方式:家庭挂毛主席像,有的就在毛主席像前开

家庭会,有的姐妹们联名给毛主席写信。我家对门张仁轩医生,儿子在报社印刷厂,有一年寄来两大幅毛主席像,张医生送给了我一张,我贴到主屋的正面墙上。老祖母专门换了一件新衣服,恭恭敬敬向毛主席作了三个揖,然后布置我们:“今门儿,要包包子吃!”在我们那里,包子即指饺子,过节的标志就是吃饺子。我们的老乡,沂南县土山区后交良村的劳模朱富胜,曾在全县的军民联欢大会上讲话说:“等打走了鬼子,咱天天吃包子!”就是指胜利了天天过节的意思。

我先写了《纪念‘七一’秧歌》,在报纸上发表,又专写一诗记述我家过“七一”的情景。1946年7月24日,《大众日报》发表的记者方艾、兆南的综合通讯报道

《鲁中人民热爱毛主席》,里边有我村妇救会长高荣菊和识字班指导员郑福美给毛主席的信,是我代笔的:“毛主席,在前几年,俺们妇女们大门不出,二门不到,只有在家推磨办饭,现在能赶集,能参加各种会议了。过去俺的生产叫地主剥削去了,年年挨饿受冻,还得给地主伺候,拿尿罐子,给地主的太太洗衣服,过去俺妇女缠足,骨肉折断,成了残废,现在减了租,俺的生活改善了,上了识字班,参加了大生产,发了家,都是你毛主席给俺的……”

当时家喻户晓,流行很广的一首歌《七月一》,后来重读报纸,才知道是我的老朋友音乐家、诗人安林写的,1945年5月22日《鲁中大众》载有详词。

安林老朋友,应说是一个老

师,当年他在鲁中文协工作,1946年12月春节文娱材料创作竞赛评奖,我的剧本《保卫大翻身》被评为甲等第一名,就是他主持与助力的。他的另一首歌《抗属韩淑芬》,也很流行。这首《七月一》,十分欢快优美,第一段前四句是小快板式的欢快,后四句是慢节奏的优美抒情,在低四度与中六度之间上下回旋,表达着人民对党的敬爱,亲切的深情:“……你献旗,我敬礼,咱们要献好东西,什么东西最宝贵,信仰共产党信到底。共产党,领导咱,坚持抗战整八年,建立抗日根据地,解放人民一万万;没有你,就没有俺,永远跟着你向前,团结起来大反攻,联合政府快实现!”这优美抒情的歌,一直在我心头萦绕。

## 我和梅姐

## 上游击学校

这是个流动着的学校,也可说是不断转移的军营,学生们是学生,也是战士。

□蔡如葛

解放战争后期,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,梁山一带一些县区干部的子女组成了一个游击学校,我当时13岁,也成为其中一员。这是个流动着的学校,也可说是不断转移的军营,学生们是学生,也是战士。我们学习的课堂,夏天,多在村旁树下或青纱帐里,膝盖当课桌,砖头、石块即坐凳;冬天上课,只好在房东家麦秸铺的大地铺上。课程内容,除语文、数学外,就是报纸。大家最迫切知道的是解放军大反攻的实况报道,最能鼓动我们年轻的心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檄文。同学们像战士一样,行军、操练、投弹、射击;十五分钟内完成起床、打背包、集合站队等项目;十五分钟吃完一顿饭,谁若完成不好,就按“军纪处置”,然而,我们那些青年却都能适应,整日处在紧张的欢乐之中……

这段时间,我和腊梅姐之间还建立起了一段难忘的情谊。

记得,一次夜里紧急集合,我困得迷迷糊糊,打不上背包,我的一位青梅竹马的女同学——腊梅姐,闯进男生住室帮我迅速打好,使我免受了一次“军纪处置”;初次投手榴弹,腊梅姐只投了两米远,我一跃而起拾起来把它投向远处,避免了一次可能的“伤亡”;同学们在一天夜晚跟随第二野战军渡过黄河到“拉锯区”去刷标语,我和腊梅姐是一组,每条标语都是我们俩共同完成,我写“打到南京去”,她就写“活捉蒋介石”;她写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”,我就写“解放全中国”……

那是夏天的一个黄昏,我们行军在前沿阵地的田野上,突然两架敌机俯冲下来,接着就是“哒哒哒”的机枪扫射声,老师命令我们钻进青纱帐就地卧倒,我和梅姐却趁老师不注意时猛跑到路上拾到一个子弹卡,之后我俩共同动手把它做成笔架,她见我爱之若宝,就把它归了我。

光阴荏苒,在一个严冬季节,我们这届学生毕业了,我和大部分男同学分配到解放区搞土改复查,梅姐和几位女同学被派去前线做随军护士。学校欢送会开完,我帮梅姐背着行李,送她上了军车。车开动了,我不知说什么好,还是她扔下一句话:“我给你带很多子弹卡来!”她上前线了,一去杳无音信……后来听说,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,她勇敢地救护了许多伤员,待救到第十个伤员时,敌机俯冲下来,随即是机枪扫射,她猛地扑到了伤员身上,伤员得救了,她的身上却鲜血淋漓,她挣扎着爬了好远,拾到一个子弹卡,她的手紧紧地握住子弹卡不放,同志们去抬她时,掰都掰不开……

梅姐,你知道吗?咱俩做的子弹卡笔架至今还保存在我身边!

## 从未走远的倔老头

2011年建党80周年前夕,我曾拜访过一位老人。如今,老人过世七年多了,可每当想起他,那个穿蓝布棉袄的倔老头的身影就会浮现我面前,让人陡生许多的思念和叹息。这位老人就是1925年入党的山东著名的老共产党员张文通。

□张贵君

论乡里辈分,我该喊他老爷爷,我从小就听关于老人的故事,也算是忠实的粉丝了。终于在那一天,我见到了传说中的“偶像”,当年他已是95岁高龄了。

那天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。寒暄几句后,老人说,“孩子,其实我什么都不是,我只是一个老古董。”在那堆厚厚的书稿前,“老古董”给我讲故事,一聊就是一上午,思想跨越了上百年。

老人清晰的思路大致有四个主题:应探讨“耕者有其田”的土

地制度;台湾问题会水到渠成,完成祖国统一大业,视野应更广阔;马路靠右行不符合自然规律;提倡恢复使用繁体字。

我怔怔地听着,在当时,那些观点闻所未闻,甚至过于“怪诞”。直到多年后,我才慢慢悟出,所谓对组织和国家的忠诚,竟可以是这样另类,而类似的一些观点,今天已在坊间悄悄流传。

这位“老古董”到底是谁?他就是1925年入党的山东著名的老共产党员张文通,我们村走出的共产党的“大干部”。与其他大

干部不同的是,他没有写自己的回忆录,没把自己拍成电视剧,甚至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,这位抗战时期的“八支队”政委、当年的西南局财政大员、后来的粮食部主要干部,越来越鲜为人知,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
在泰山脚下,旧日的辉煌早就成了一片浮云,他低调地过着自己的晚年生活,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倔老头,他每天唯一做的事情,就是撰写他的长篇治国手稿,那里有他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。

我问老人:想不想再回寿光

老家看看?老人淡然地说,繁华见不得,贫苦见不得,还是不回了吧。老人倔强地认为,生病最多打三天针,三天之后听天由命。老人白寿之年驾鹤西去,果然再也没有回到故乡。

10年过去了,我写的那篇人物访记,因为老人当初的坚拒,始终没有发表。而老人撰写数年的治国手稿,大概至今也未出版。

如今,这些记忆的碎片又漂浮起来,老人不会再拒绝吧。那个矍铄的蓝布棉袄身影又在眼前蹒跚,似乎从未走远,然而,呜呼,如此倔老头,何处再寻!

## 我的启蒙老师是地下党

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的日子里,我回想起我的启蒙老师,思绪万千。

□李贞寅

老师姓薛,和我同居住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(长清区张夏镇小寺村)。弟兄四人,他是老大。在解放前的那个年代里,他的家庭是个较富足的农户。薛老师从小上过私塾,读过四书五经,他从年轻开始就读了不少进步书籍,不断接受地下党组织的教育。抗日战争时期,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入党后他在本村小学任教,以一个小学老师的合法身份掩护着自己的进步行动。他在任教期间,经常有些外地的陌生人来找他,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些陌生人是地下党组织派来和他接头,收集情报和向他交代任务的。

在抗日战争的年代,我们学校每个学生都有两种学习课本,一种是日伪政府印刷的课本,一种是从抗日根据地运来的油印的抗日教材。其实日伪政府印刷的课本只是一种摆设。我们天天学

习的是抗日教材。薛老师在给我们授课时,不断给我们讲解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。他常对我们说,小日本是秋后的蚂蚱,蹦跶不了几天了。老师说的还真准,没过几个月日本鬼子真的投降了。为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,学校还开了庆祝会,坐在台子上的有学校管理员、老师,还有几位陌生人。抗战胜利了,可没过多久,我们村庄竟成了国民党的占领地,从此,薛老师不知去了哪里。后来听知情人说,薛老师怕暴露身份,躲进深山老林里参加了游击队。

一两年后,也就是1947年冬季的一个下午,我终于又见到了薛老师,他带着几个陌生人来到我家里,和我父亲说话说了好长时间。薛老师急着要到其他人家里去串门,父亲把他送走后,得知薛老师他们接受了上级党组织交代的任务,回家乡广泛发动群众,夜晚去扒掉津浦铁路,切断敌人的南北交通运输线,为解放济南

做好准备。

这天夜幕刚刚降临,全村的一些进步青年相互约着到村中心的一个打谷场里集合,有的扛着杠子,有的带着绳索,有的扛着铁锹,有的扛着梯子腰里别着钳子。薛老师站在一块石头上给大家做动员讲话,最后他说:“大家要注意安全,不要怕,守卫火车站的国民党士兵不敢出动,我们安排了足够的力量准备打阻击。”

天已全黑下来,扒铁路的队伍在薛老师他们的带领下出发了。因我父亲也是扒铁路的一名队员,所以我们一家人那一夜都未入睡,等父亲回来听听扒铁路的喜讯。夜已经很深很深了,那时又没有表,也不知道深夜几点钟了,父亲在敲大门,我们赶忙给父亲开门。大门一开,见父亲肩上斜挂着一捆铁丝,他说:“这是割的电话线,弄回这捆拉在院子里,晒个被褥和衣服用。”父亲进屋,给我们介绍起扒铁路的事情经过:

“我们一到津浦铁路,其他村去扒铁路的群众也赶到了,薛老师指挥着扛梯子的队员,先顺电线杆立上梯子,把电话线全部剪断,又指挥扒铁路的队员扒掉一根铁轨,接着套上绳索往山里运走一根。扒掉铁轨之后,薛老师又指挥着把垫铁轨用的枕木一段一段堆到一块,然后用火点燃,那熊熊的烈火照得周围通亮通亮。薛老师带去的队员,大约扒了十多里路的铁路。扒掉的铁轨运出六里多路,填进了一个山沟里。”父亲还说:“津浦铁路上的石店大铁桥也被游击队炸掉,津浦铁路济南南线全部瘫痪。”津浦铁路济南南线一段被扒掉,为济南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薛老师,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,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,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日子里,我写此文对您表示无限的崇敬和怀念。